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

目 录

- 巴金在西江乡师..... 欧阳可羽 (1)
- 高信先生热爱桑梓..... 龙泉 老干小组
侨 联 会 (11)
- 民国年代新会修县志
- 两次未成书的原因..... 伦海滨 (14)
- 旅居越南五十年..... 谭振初 (19)
- 保七团在新会抗击日军亲历记..... 梁 焯 (32)
- 关于新会乡村工作者协会..... 欧阳大振 (38)
- 吕迪统枪杀贼头墨标前后..... 吕天祥 (41)
- 新会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 邝均怡 (43)
- 介绍本县两位美术界人士..... 容 辛 (45)
- 荷塘纱龙..... 黄 蕾 (48)
- 我所知道的“苟记腊味”及其他... 黄 相 (50)
- 《登崖山观奇石诗》作者考..... 欧济霖 (53)
- 参加学生运动的回忆..... 何坤巽 (57)
- 广东硬币图谱..... 伦海滨 (封里)
- 新会城街名考..... 朝 练 (56)
- 作者·读者·编者..... (61)

巴金在西江乡师

• 欧阳可羽 •

巴金对西江乡师的赞美，从1934年出版《旅途随笔》开始，到半个世纪以后，1983年8月，巴金还在一篇《怀念一位教育家》的文章里再三赞美这间乡村师范（见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病中集》61页）。他说，我们的学校象一个和睦的家庭，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

到1985年9月，巴金仍在《怀念叶非英兄》一文里（见《无题集》）反复提起我们学校及其创办人。西江乡村师范在探索教育改革道路上是有过艰苦的历程。

巴金在西江乡师的一些活动

巴金是同陈洪有在一起抵达西江乡师的。1933年4月4日西江乡师举行周年纪念大会后，出版了《西江乡村师范学校周年概况》。陈洪有随即携带这册《周年概况》离校北上，一方面为西江乡师的教育改革工作争取社会人士的支持和赞

助，并且到各地考察教育工作，在上海还访问了一些文化教育界朋友。巴金就是这时与陈洪有相约乘轮南下。五月中旬从上海启程，经厦门到泉州逗留一周左右，再经厦门抵达香港，然后由广州市来到我校；那时正是1933年五月最后一天。

巴金就这样悄悄地来到西江乡村师范，当时学校没有举行什么欢迎集会。巴金住进我校庶务室的房子里。我们同学上课时，他就忙着自己的工作，常留在光线明亮的阅览室里，有时也到村里的市场走走。他和蔼可亲，主动接近我们同学，我们同学也把巴金当作自己的亲人。一天下课以后，我和几位同学在校园一角看书，巴金走来，知道我手中的是他写的小说，便把书本拿过去改正了几处印错的字，并同我们笑谈小说里的人物性格。后来我拿着巴金亲手改过错字的那本书，向同学传讲巴金谈笑的神情动态，自以为无尚荣幸。

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几位同学成群走到庶务室看望巴金。我拿着《灭亡》一书去问巴金：你《灭亡》一书的扉页印上世界语**LA PEREO**，为什么不象其他书本那样印上英文？巴金说：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我很爱世界语；但是，你们是不会**LA PEREO**（灭亡）的。巴金风趣的话语，逗引得大家大笑。

早上起床，我们都到水井里打水洗脸。井水深达三米多，用麻绳系着木吊桶打水。水井旁边的高墙上写着“自食其力”四个大字。巴金自己也来动手打水，不管怎样使劲地动作，小吊桶总是浮在井水上，打不上水来。大家围着看巴金那种既用力又笨拙的动作，忍不住哈哈大笑，结果还是我

们同学接过来，一下子把水打上。巴金抬头望着同学而自己也大笑，连声说：你们有法子，我笨我笨。

巴金跟我们一起在饭堂吃饭，无拘无束，好象对我们用公共卫生筷子很习惯似的。我们几个同学凑近巴金身边，认真地对他说：放开肚皮吃吧，食堂是我们师生自己办的，我们食事组有条规矩，来往客人开膳不超过一星期的，经交际组同意，一律免费招待，不收膳费。巴金听着，忙竖起筷子，左顾右盼，连声赞好：这条规矩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巴金在校逗留时间短，和同学们接触的机会也不多，临别前夕，学校举行一个谈心会，算是话别会，巴金和全体同学见面并讲了话。巴金要走了，我们依依不舍，而且议论起来：为什么不请巴金演讲？为什么不请巴金介绍中国和世界文坛状况？为什么不请他讲写作经验？机会难得啊！

巴金写西江乡师的文章

巴金在5月31日到达西江乡师，前三天在学校，随后就到县城随近的天马乡、茶坑乡、天禄乡，游览访问三天，由会城到公益过了一夜，6月7日傍晚回到学校，6月8日晚上参加了我校为他召开的谈心会，6月9日傍晚离开西江乡师到广州去。他游历了富有意义的南国乡村。

不久，我们读到巴金在上海发表的文章，如《庶务室的生活》、《农民的集会》、《鸟的天堂》、《机械的诗》、《谈心会》、《朋友》、《别》等等，欢欣不已！我们心中

要对巴金说的心里话，我们心中要对巴金表白的情感，巴金都看透了，在这些文章里给我们表达尽致了。这些动人肺腑的篇章，直到现在，几十年来，师友们都引以为荣幸，称作西江乡师精神的史诗，成为维系西江乡师全体师友的纽带，使西江友谊长青，以下介绍有关这几篇文章的背景：

《庶务室的生活》

《旅途随笔》（1955年上海平明版），里面七篇文章，《庶务室的生活》排列最先，它写出了西江乡师的教育改革精神。《西江乡师二周年概况》曾转载过这篇文章，同时转载的还有《别》。我现在想提出的是巴金在《庶务室的生活》中引述一位上海年青朋友给信女友的一段话：

“……好友，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是这样地乐观呢？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生活所给我的影响。从这生活里我仿佛看见了理想社会的轮廓，因而生出了大的希望。他们的亲爱、热情和天真，使我忘却了现社会里的仇视、欺骗和倾轧。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了。”

这段话，是一位署名“一石”的作者在一篇标题为《西江乡师底生活》，副题为“给友人的一封信”的文章里的，巴金引用了，该文章的末尾还写道：

“西江乡师是一个与别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它不象过去的晓庄，更不象劳动大学。它是具有他们底长处而重新创造的一种理想教育。除了‘做学教’之外，他们更注重着在‘育’。现在的学校大多数是教而不育。其实教还是其次，那最重要的事是‘育’。普通讲学校是教人读书的地方，我觉得不仅只教人读书就可了事，而是要教人怎样做人，怎样

生活的。”

这位青年朋友“一石”的真姓名，现在我还未知道。可是当年作者指出我们更注重在“育”，倒是实事，学校制订的“学生须知”，就是特别强调了“育”字。本校底宗旨是：以培养乡村教育人才，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为宗旨。

我们所希望于各同学的，是对于本校底目的和方针，仔细地体会而力行！从那里，同学可以了解本校是具有怎样性质的一个学校，可以了解入校以后该做怎样的一个人。本校不象普通师范学校那样单给学生读一些教育的课本，我们并不希望同学做一个教书匠。本校虽是师范学校，但决不是搏取资格的地方，决不是给文凭与同学去找混饭的职业。本校虽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愉快、美满生活的社会，但本校绝不是享乐的后方，我们是希望同学在这学校养成刻苦牺牲等习惯，以准备去创造理想的社会。凡此种种，均希望再三考虑。如有不满意或稍存勉强的，不必进这校；尽可到自认为满意的、愿意进的学校去。

入校以后该做怎样的一个人？

为了要达到我们底目的，生活必须有中心。这生活的中心是：

第一，学问的研究，不是专靠课堂的讲授，不能依赖辅导员，须有自动研究的精神。更不能依赖课本，死记书本；生活上底一切都是学问，能应付实际生活的才是真学问。

第二，品性的修养，这是本校特别注重的。一个品性很坏的人没有资格去改造社会。革命必须从个人底品性革起。思想上的恶习，如虚荣、自私自利、升官发财等均是人害、害

己、害社会的思想；行为上的恶习如说坏话、奢侈、好闲食、不守秩序等均是普通人的恶习。不能吸烟。本校对于这些恶习均有制裁的规律。……

当年学校以此要求学生，学生也以此自勉，巴金感触了这些气氛，就从文章反映了出来。

《农民的集会》

三十年代初期，新会天禄乡有些人却从教育入手唤醒群众，起来推翻自己家乡旧势力的政权，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惊动了当时县里许多官绅。《农民的集会》一文，就是反映了西江乡师创办人之一叶渠均在家乡和一些人从事这种活动和影响的篇章。当年叶的妻子区巾雄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回乡出任了天禄小学校长，还有该乡青年叶子群（曾任西江乡师辅导员兼小学部主任）从东南大学师范科毕业回乡，他们以学校为中心，团结本乡青年，组织青年参加各种活动，提高农民的觉悟，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巴金的来到，增添了天禄乡农民斗争的勇气。

后来，接管乡政成立了“新会县天禄乡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实验区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成立生产、教育、建设、卫生（包括设立医疗保育室）、生活互助……等组织，推动乡政，改变了作风。我曾任教于天禄乡实验小学校，参加实验区委员会工作。当年叶渠均给天禄乡实验小学校题写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校训”。小学校的教师，晚上分赴青年夜校和识字班工作，或到农民家里谈心。

巴金的《农民的集会》反映当年该乡农民的新风貌，可说是一篇光辉历史文献。

《鸟的天堂》

在西江乡师的创办人陈毓就、梁朝令、叶渠均等陪同下，巴金游历了一些当时受西江乡师影响较深的新会县农村地方。天马乡在县城南面六公里，是陈毓就的家乡，乡里有两间小学——务本小学和达人小学，都是西江乡师的特约实习小学。天马乡的东南面是茶坑乡，梁朝令的家乡；西面是天禄乡，叶渠均的家乡，天马和两乡毗邻。巴金在《鸟的天堂》一文提到“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面，许多绿树拥抱着它，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那里是朋友丫的家乡，我明天就要到那里去，登那山，上那塔。”这是指茶坑乡熊子塔。这三个连成一片的乡村，在地埋位置上也是新会县的中心点。

巴金在天马乡务本小学校里吃过晚饭，游览天马乡土名“雀墩”风景地方，就以此为题写了《鸟的天堂》这篇文章，从此以后，这个历来被披上封建迷信色彩的“风水”地点——雀墩，就成为我国著名的“小鸟天堂”风景胜地。巴金此文，富有破除封建迷信意识的革命精神，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特别是解放以后，开辟了公路，整顿周围环境，建设成为名传遐迩，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旅游区，使地方更繁荣兴旺。

三年前，巴金还接受陈洪有所请，为“小鸟天堂”题书。去年（1987年）“小鸟天堂”扩建，巴金的题书已建在旅游区的大门上，增添了光辉。

《机械的诗》与《谈心会》

当年，梁朝令辅导员曾对我说，巴金在《谈心会》一文

皇，批评了陈洪有，叫我仔细阅读。后来我逐渐知道多一些情况，也有一点体会。特别是1985年我试图搜集整理西江乡师史料时，陈洪有把他保存了几十年的《旅途随笔》一书给我参考，书里有许多他自己的批注。有一次我和一位姓赵的同学去见陈洪有，他指明书中批注，告诉我们，巴金公益之行是去会见黎百强（别名健民）和李元燊（别名太一）。

巴金在《机械的诗》一开头就说：“为了去看一个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

李元燊、黎百强、吕绍谦（均新会县人，同是广东大学法科毕业）都是我校校友。李元燊在会城设有律师事务所。黎百强在公益负责新宁铁路工人子弟学校。那时李元燊、黎百强、吕飞、刘江海、叶楚魂等人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在新会出版了《民钟报》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1932年3月1日省教育厅批准西江乡师设立校董会及立案，校董会名单公开传出，社会上就纷纷议论西江乡师是无政府主义的学校。西江乡师和陈洪有等人的处境就显得不妙，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西江乡师受到嫌疑。

西江乡师的处境，陈洪有心里明白，他回忆说：“我在会城介绍李元燊等与巴金相识，巴金提出大家去公益与黎百强会面，我当时答应同行，结果我因事没有去。”

巴金在《谈心会》里意味深长地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话说：“爱真理，孩子，爱真理吧；爱护真理使它永远光明，它会使你青春的早晨欢欣，虽然这需要你一生的苦痛和斗争，但它将使你永久保持着正直和真诚！”又说：“生活是什么？我可以比之于一股水流。这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径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

那唯一的生命之海。”

接着，巴金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也没有理由责备 A（陈洪有——引者），因为他这一晌来实在太忙了。他把他的全部精力完全化在学校的事务上面。……他实在没有精力来充分了解我的话语。”——这里用上“全部”“完全”的字眼，含意是多么深切！

巴金的谈心，甚至还说“他现在是太疲倦了，他应该去休息。”“我本来就应该请另一个朋友来替我翻译。”巴金不满之意，显而易见。

《谈心会》写于1933年6月，末尾就说：“第二天傍晚我离开了那学校，以后也就没有再去。我再没有机会去参加那里的谈心会了。”果然，这些话预言般地真确了，以后事实上不能再来了。

没有丝毫私利或野心

1934年4月出版的《西江乡师二周年概况》的《引言》中，向社会人士宣布：“我们事业，并不是私人的企业，我们都不过是这事业的公仆罢了。我们只有一颗热烈的为事业尽力的心，没有丝毫私利或野心在。如社会人士以为这工作应兴或应革的地方，甚愿能竭诚相告，更希望大家能为这工作共同努力。”

在《概况》里又写道：“那许多不了解我们的人，或因私人的利害而嫉忌我们，甚至破坏我们的，我们很感为难！在如今这矛盾的社会底下，我们只好在困难中找一条出路。”

巴金也说清楚了，“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

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见《巴金选集》740页，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那时期国民党在搞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提倡读经，宣扬复古，西江乡师的教育改革工作，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非拔除不可，被迫停办。

不久之前，我又读到巴金发表在香港大公报（1986年9月8日至15日）上的《怀念非英兄》文章。知道叶非英老师死在广州市石井劳教场的遭遇。这与西江乡师受迫害停办，虽然两者情况各异，时间相距三十多年，但都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借口的。同时在新会、江门地区也株连西江乡师同学，区巾雄因此害怕得死去了。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被迫停办已经五十年，如今天翻地复，时代不同了。我整理西江乡师的史料，本文所记述的，显然未能全面反映巴金在西江乡师的活动情况，更不能说我很清楚了解巴金的事情记述得准确无误，有望西江乡师诸师友及同志们的指正和补充。

（上接第13页）生。说到深处，令当时一些人感动得流下泪来。后乘船回龙泉即在张祠门前召开乡绅群众大会，同样谆谆教育村民，更披肝沥胆告诫同乡不要滋事生非。并建议利用本村千多亩山地，尽行“点松籽”造林，不上十年，便可陆续砍伐，将其收益用于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多出人才，则本乡繁荣兴旺，便有所希望焉。

数十年往事历历在目，特志之。

高信先生热爱桑梓

老干小组
龙泉 侨 联 会

高信先生是新会县龙泉人，热爱桑梓为民造福，谨记其事，以留史册。

热心教育事业。统一私塾，成立龙泉小学。

高信先生常告诫乡中乡绅，务祈发展教育，办好学校，培育人才，为国家为民族谋幸福。抗日战争前，我乡张、李、高、吴、刘等大姓及中柱山（即东成村）均用公尝收入来办私塾和初小，各自为政，只培养本姓子弟，但无高级小学。是以除个别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能送子弟到县城就学外，绝大多数青少年皆不得登中学之门，埋没英俊，致愚昧落后相沿。一九三七年冬，日寇侵犯我国，广州紧张，青年吴锡坚就读中大，被迫停学回乡，深感各姓分散办学落后于形势，乃与张子结（君诚）等回乡知识青年，劝说乡绅统一办学。得高信先生鼎力支持，创办龙泉小学，由先生任名誉校长，张光荣为校务主任，以各姓祠堂为课室，从此统一为乡立龙泉小学，结束了分散办私塾和初小的局面。

为了清新教育空气，由吴锡坚往会城聘请梁绥楠为教导主任。梁是中共党员，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已入高潮，在梁的努力下，龙泉出现新的政治局面，学生高唱抗

战救亡歌曲，响彻云霄。不久，梁在学生中发展张剑、李海、戚远等十三个党员，建立中共龙泉支部，成为推动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许多有机缘的学子，能按级升学以至深造，至今遍布海内外得以成材。解放之后，不少在县内外当上干部、医技、实业人员，在海外如旅加侨领李志惠（加拿大华侨访华代表团团长），张炎荣（加拿大海外地产投资公司董事），香港刘启法等先生，莫不是当年的初、高小学生。万丈高楼从地起，饮水怎能忘记挖井人？

支持筑围堤，防洪水，保护农田。

龙泉如岛国，纵横直径两公里，面积四平方公里多，山丘和村落约占一半，村前一太片平原，捍卫这片冲积水田的围堤既低矮又单薄，芸芸众生，只好看海龙王脸色吃饭。西江洪水为患，低田常颗粒无收，有收也是生芽谷。好年景也是早四（四箩，即二百斤）、晚六（三百斤）。如围堤崩缺则洪水涌到山边，房屋不没顶也浸半壁，百姓苦不堪言。高信先生一贯关怀家乡，抗战胜利后，适联合国救济总署有项修建农田水利的“无偿贷款”，先生亟力筹谋，由省给龙泉无偿贷款。修建水利工程，此事由归国华侨李圣辉先生主持，历时两年，修筑龙泉本乡全围，及蛇北至大王角冲、三角上沙等约八千丈，受益田亩3,820亩，房屋也不再受浸，为发展农业生产奠下基础。

由于工程浩大，非龙泉劳力所能担负。于是雇请毗邻村庄农民分段承包工程。是时贫苦农民常陷饥馑，大蟹、百顷的劳力都被吸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遂以米计酬，每井泥给米一斗，培草皮每方丈给米一斗，勤劳的每天可得米十

斤，本乡和外村穷苦农人皆大欢喜。先生此举，既达到修围防洪，又使劳苦大众得谋生计，实属义举。

平息三龙械斗

三江和龙泉是我县两个较大的自然村，相距约五、六公里，建国前三江人口一万，龙泉人口五千，两村常互通婚姻，亲戚往来密切，但因封建遗留沙面权益，时有纠纷，以至两乡不和。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江龙泉两乡豪绅为了确保其利益，互相争夺，各不相让，酿成流血事件，几造成大规模械斗。双方剑拔弩张，械斗迫在眉睫。在这紧急关头，高信先生关心桑梓，热爱家乡，为了两乡人命财产安全，力主和平解决，乃敦促第一区行政专员何彤派兵调解争端，何遂派“龙飞”、“凤舞”两浅水舰从广州出发到现场制止，两乡械斗才告平息。龙泉、三江人民均得以避免这场灾难，皆赖先生之力。

械斗暂告平息，虽解燃眉之急，而潜伏祸患仍存在，为使两乡械斗不再重演，先生于是年秋由亲侄两人乘火船到三江召集乡绅开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明械斗利害。曾谓：“我是龙泉人儿女，亦是三江人儿女，我母亲亦是三江乡人，我们两乡姻亲占三几成，碰面都属亲戚。试问甥子打亚舅，表兄杀表弟，手不会颤抖吗？心不会不痛切吗？……枪炮对阵，必然要死人，试问往后那些可怜的孤儿寡妇来走亲戚，双方如何陪眼泪……”指出双方因械斗而派钱派丁耽误耕作，耗费公款，甚至家破人亡的种种灾难。这种谆谆教诲，使人深受感动，最后指出应将财力人力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多出英才，多办实业，去改善民（下转第10页）

民国年代新会修县志

两次未成书的原因

· 伦海滨 ·

民国年代新会编修县志，经过许多曲折，始终未成，在编修地方史志上确属憾事。现将情况向读者作介绍。明知挂一漏万，但志在抛砖引玉，望知情读者加以订正、补充。

新会编修县志的倡议，从一九二九年开始，至新会沦陷，足足有十年时间。由于当权者争权夺利，导致两次胎死腹中。直至今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盛世修志才获得成书。

事情得从一九二三年新会书院落成说起：新会书院是新会当时唯一的大建筑物，建院款项是用入神主牌位办法获得八十多万元，除支付旧县署公地地价七万多元外，建筑费计正座一连两进和两旁附间十八万元，后楼一座十二万八千元，其他零星工程三万多元，共三十多万元外，余款尚多。后来被江门大本营强取了十万元作军费，其他军政机关先后染指，每次一万、八千元的为数不少。新会书院董事会认为长此下去不知如何了结。就将全部余款购买田地二千多亩，作为尝产。款项还未用尽，每年收益也不少，另有公地可以变卖，应该彻底解决。

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书院举行春祭例会，李榕阶（七堡人、当时任省财政厅秘书）适因事由广州返乡，路经会城，

应邀出席参加。会上李以“本县志乘自清同治年间邑侯彭君谷续修之后，迄今垂六十年而未修，遗文轶事湮没者多，应乘时修补。”建议将尝款开馆续修县志。当经全体董事通过，并推举李进见县长黄维录陈述一切，获得批准。即以书院董事容启蕃（泽城）、黄震川（跃门）（两人均是前清孝廉，时年皆八十多岁）等为首成立修志馆董事会，进行筹备工作。人选方面该会以“事关修志，搜集遗文轶事，非有文豪出而专任，指导进行，难收良效。本书院集议，全体院董一致赞同聘请李榕阶先生为修志督办，借资指挥，奉作楷模。”于同年三月四日专函聘李榕阶，并附聘书。（引文见李榕阶著《致知草堂文稿》卷三，1931年编译书馆版，下同）

李获书院董事函后，认为“公等举榕阶任本邑修志局督办，闻命惶悚，惭弗克当。自维谫陋，且供职财厅，并筹裁厘加税事宜。彼此遥隔，奚能兼顾？……今者因事偶抵邑城，获与诸公把晤，不弃驽钝，承囑协商修志事宜，深感相爱之诚，又以事关大局，遂竭棉薄，勉效驰驱。至于督办一职，实弗敢任……应请另举贤能。”函复董事会。（引文见上书）

旋董事会以“查修志为历史之表彰，关系重大，非有品望素孚，学验兼优，弗能肩此重任。董等素仰先生品学卓著，且历任要政，口碑宣传，尤为邑人共仰，督办一职，非公莫属。董等业已开会讨论，一致请求，务恳迅将辞意撤销，勉为其难，借资指导，奉作楷模，以期早日完成。”专函加以挽留。（引文见1929年3月5日董事会函）

经过不下五十次函商，李始允“馆长一职暂为权理，关于财政出纳，应请举贤能专任。其总分纂各员，仍望早日开

具姓名及堪任事项，俾得函聘，借资商订……至于馆长薪修（月薪三百元）……（仍）不愿受。”（李裕阶六月三十日致董事函）还拟聘李扬芳（字毓卿，前清孝廉）、朱沧浪等为编纂，以为就可以开始工作。

谁料县事委员会简清吾等小集团从中作梗，认为院董无权编修新会县志。接着国民党县党部又飭会将修志馆依法登记。这些人出而争修县志，目的是要越权提拨院产。

李闻讯后，致函书院董事，除列举私人编修国史、省志、县志事例，加以驳斥外，还说：“我邑团体甚多，未闻有及早提议，能筹备修志的款者；有之，则邑乘久已完成，宁复迁延以至今日？县委会所云，新会书院绅董团体从何取得修志乘之权，抑何所见之不广也。且考诸史册，同是一人一事，纪载不妨有两书（例略——引用者），是两书不嫌其并见。如逆料书院所修之志不善，彼亦可自为一志，奚必撷拾书院过去旧事，以排斥今日之修志。假令无人商请财厅核准将地投变修志，恐无人过问；今已核准投变，彼思投得巨款，乃相率而攻击院董，是所谓玆兄之臂而夺之也。宁得谓平？又查各县修志，均无在县党部登记成例，即现在开修省志，何尝在省党部登记？今县党部乃加以大令，飭令登记，实未明系统，即令行文于所属机关，亦应俟该机关成立后为之。今馆尚未开，遽投以煌煌训令，吾不识主事者为何如人。然其识见学问，固亦可想而知也。”（见7月10日致董事会函）李经此打击，坚决辞职不干，修志工作也停顿下来了。

一九三二年夏秋间，由县参议会、县市党部、县市教育会，各区公所代表组成新会县修志委员会，县长黄槐庭为当